

韩国研究丛书之二十四

主 编 沈善洪

副主编 黄时鉴 金健人

韩民族 文化源流

苑
利
著



学苑出版社

韩民族文化源流

苑利 著

江蓝生老师斧正

学苑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春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民族文化源流》论文集/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
编苑利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3

(韩国研究丛书)

ISBN 7-5077-1479-9

I. 韩… II. 浙… III. 传统文化-研究-韩国-文集 IV. G13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305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余杭市大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开本 11 印张 290 千字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3 月余杭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单价:29.00 元 总定价:290.00 元

韩国研究丛书

总序

还是一九九二年三月，我应大宇财团金宇中会长和韩国社科院金俊烨理事长的邀请，首次出访韩国。这个素称“君子之国”、“礼仪之邦”的民族，让人惊异於一种古典美与现代美的融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契合。

中国与韩国，都地处世界东方，都有着五千年以上的文明，还都曾长久地使用过同一种文字，至今秉承着大体相仿的文化背景。正如欲寻西方文明的踪迹，就不能忽略地中海沿岸的任何地方一样，谁如欲探溯东方文明的渊源，就不能不了解韩国的古文化。中国与韩国，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

正是基于对过去辉煌历史的开掘和对未来光明前途的开拓，我们编辑出版这套“韩国研究丛书”。由本校相关系、所的兼职研究人员为基本队伍，发展同国内外韩国研究方面专家、学者的合作研究。学术研究以传统文化方面为重点，主要包括：韩国的历史、文化与现状，中、韩文化的比较与交流，东方文化。课题范围涉及历史、哲学、文学、语言、艺术、政治、宗教、经济、教育、法律、新闻、旅游等各个领域，其成果以论文集或专著形式相继出版。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金宇中先生和金俊烨先生为共同弘扬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不少有识之士预言：一个“太平洋时代”正在到来。日本的经

FF871-8

济领先,韩国的经济腾飞,呼应着东北亚的是东南亚的经济跃进,而中国,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引起了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大变革,这一切既预示着崭新的历史机会,也昭示着严峻的时代挑战,而“可能”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隙罅,只有凭血汗辛劳才能填补。尽管前路漫漫,然而毕竟世界文明中心的东移,已经在太平洋绵远浩瀚的西海岸激起了阵阵拍岸潮头。

浙江的宁波古称明州,曾是中国与韩国海上交通的大港。当时朝廷为高丽使节处理公务和食宿之便,特命创建“高丽使馆”,至今遗址尚存。朝廷还派遣使臣在明州建造两大神舟,一号“凌虚致远”,一号“灵飞顺济”,都“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鸱首,屈服蛟螭”,出使高丽之时,“倾国耸观”、“欢呼嘉叹”,高丽国王也抱病出迎。随着一度中断的中韩关系的复交,这条历史上的黄金航线必将续接,我们也能从宁波港乘船东航,在万顷碧波之外,迎迓旭日东升的壮景。

我企盼这一天的到来。是为序。



杨 序

听说苑利同志的新著《韩民族文化源流》就要出版，高兴之余说上几句权当作序。

据我所知，苑利同志从做研究生的时候起，就已经开始反思韩民族文化来源问题，一晃已有十五六个年头。在前七八年里，虽然资料搜集从未间断，但他不曾发表过一篇有关韩民族文化来源方面的文章。1991年，在他访学日本，即将回国之际，才在日本“中国民话之会”为他举办的个人专题学术报告会上，首次发表他的韩民族文化南来说。回国后，正赶上我们北大韩国研究中心的《韩国学研究》创刊，经葛振家先生举荐，他的长达五万余字的《朝鲜民族南来考》在这里发表，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短短几年间，在这一领域共发表论文三十余万字。由于他在韩文化来源问题上自成一说，所以很快便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在国外举办过多次专题学术报告会，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的论文也有二三十万字之多。

聊起这件事，流露在他脸上的有喜悦，但更多的是一种莫名的苦恼与无奈。他说，从他搞这个课题起，心中便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人以为这未免有点异想天开，有人觉得十年磨一剑，得不偿失。面对不解，苑利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搞科研我是靠事实说话，学术的特点就是创新，吃别人嚼过的甘蔗，甜不到哪儿去。当他认准这一目标后，便义无反顾地走到今天。

在韩民族来源问题上，迄今有几大学说，如西伯利亚说，阿尔泰山说，东夷民族说等等，至于韩民族与南方民族关系问题，则

很少有人谈及,更不用说系统研究。苑利认为,在韩民族文化来源问题上,西伯利亚说也好,东夷民族一支说也好,都有自己的道理,也有自己的事实依据(如韩语与阿尔泰语系比较接近等等),这与韩文化的多元性格是吻合的。但他认为以往诸说的最大问题,是无法提供对韩半岛稻作文化来源问题的最终阐释,而这也正是韩文化区别于其他北方本土文化的根本之所在。随着这一外来文化的到来,不但使韩半岛文化性格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也实现了这一文化的根本转型。因此,在韩文化来源问题上,很可能还潜藏着一个迄今仍未被世人发现的、更为隐秘、更为悠久、也更为重要的文化之源,而这个源泉,很可能正是中国的百越文化。

翻阅前期成果就会发现,由于资料的短缺,这些研究在某些方面尚有不尽完美之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资料的不断发掘,苑利同志的研究成果亦越显厚重。这一学说也由以往“大胆假设”的假说,步入“小心求证”的实证阶段,这是韩国学,同时也是中国学研究上的一个不小的突破。当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书中的某些观点可能会受到来自新资料的置疑而得以不断修正,我想这也是我和作者所愿意看到的。

苑利常用瞎子摸象来比喻自己的研究,他说:以往人们常用“瞎子摸象”来批评那些只看一点而不计其余的学人,但在我看来,瞎子本身似乎并没有什么错,错的反倒是那些心浮气躁的批评家。想想看,瞎子说错了什么吗?没有!那你还指责什么呢?人家只说了一句真话,你就打断了别人,错不在你又在谁呢?如果你再多给他们点时间去探索,莫说是大象,就是座大山,不是也能摸出它个来龙去脉么?学问需要胆识,学问需要毅力,学问需要刻苦,同时学问更需要时间,坐不住冷板凳的人是写不出好东西的。

韩文化与百越文化关系的比较研究刚刚开始,要走的路还很

长,也很崎岖,希望我们年轻的学子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苑利,走好!

杨通方

1999年4月1日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陈 序

我与苑利同志素不相识。他请我作序，实在感到突然。但碍于同事余悦教授之情，只好勉为其难。不过等到苑利同志将《韩民族文化源流》全书原稿寄来，并认真拜读之后，却真有喜出望外，相见恨晚之感了。

我只去过一次韩国，对韩国文化毫无研究，有关韩民族的文化源流，实在没有发言权。只是由于它紧邻中国和日本，是中国文化东传日本的必经之地，在研究中国稻作东传的时候，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觉得中国南方沿海的古越族（即百越族）必定在很早以前就曾到达过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将稻作文化传播过去。因此，说韩民族文化受到过中国百越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正是当我拜读苑利同志的著作后觉得很亲切，并喜出望外的原因。

长期以来，韩国以及别国的学术界，往往将韩民族定位于北方民族，其文化源流来自北方的西伯利亚，这一观点甚至被写进教科书中，可见影响之大。此外还有源于通古斯民族说、源于阿尔泰民族说、源于东夷民族说……等等，当然也有主张来源于中国南方的，但只是片言只语，并无系统研究，影响有限。

苑利同志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专门从事韩民族文化源流的研究，在正确指出韩民族文化是多元文化复合体之后，着重揭示中国南方沿海古越族（即书中所说的“泛百越民族”）对古代韩民族文化深刻影响，并将其研究成果《韩民族文化源流》一书交学苑出版社出版。

苑利同志在本书中,综合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诸学科研究成果,特别是从他所擅长的民俗学角度,以丰富的资料和广博的学识,对韩文化来源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得出了令人信服而又使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诚为近年来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一部力作。

苑利同志是从稻作文化、服饰、人体装饰艺术、饮食文化、干栏建筑、生殖崇拜、婚俗、铜铎源流、图腾崇拜、语言等十个方面来论述百越族对韩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的,资料丰富,考证翔实,逻辑严密。其中有关稻作文化的论证是本书的核心,作者正确指出韩民族文化源流北来说的致命弱点,就是它无法解释北方属于旱作农业,而韩民族却是很早就已从事水稻种植这一矛盾事实。实际上,稻作文化不但奠定了韩半岛农业文化的基本格局,而且也促进了韩半岛文明发展的进程。而要寻找韩民族稻作文化的根源,显然只能把自己的学术目光转向中国古代南方的百越族。作者从稻谷品种、农业工具、农业祭祀、火耕水耨、鸟田、踏耕等方面,论证韩民族稻作文化来源于百越族,都是很有说服力的。

写到这里,不由使我想起我在1989年为日本六兴出版社出版《中国的稻作起源》一书所写的前言《关于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中的一段话:

日本的学者都主张到云南去寻根,他们认为倭族和越族同源,而越族的起源地在云南。因为他们发现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至今还保存着很多与日本相同的文化元素,他们到了那里就好像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一样感到亲切。……

其实这些文化要素是古越族的共同特征,在古越族

活动过的地区都存在。只不过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云南的少数民族保留着更为浓厚的古老传统习俗的原始形态,给人以强烈印象。而原来古越族活动的中心地区和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一带,由于汉化的结果,古越族已不复存在,但是他们的许多古老习俗仍由其汉化的后代所继承而在当地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在福建沿海地区仍然可以找到很多日本学者所谓“照叶树林文化”要素。

接着我列举下述的一些例子:稻作文化、杂粮栽培、喜食芋头、干栏建筑、吃茶、以曲酿酒、大豆发酵食品、糯米食品、木制饭甑、木桶、竹帚和蓑衣、草席、草绳和草鞋、杵臼、鱼鹰捕鱼、赤足、于兰盆节、新娘戴斗笠、漆器、鸟崇拜、蛇崇拜、赛龙舟、文身、断发、拔牙、人头祭、从妻居婚、山岳崇拜、性器崇拜。毡疚幕 纬傻睦 这里说的是日本和闽台地区,但是如果将朝鲜半岛包括进来,将闽台扩大为东南沿海(包括江浙地区),那么上述内容就和苑利同志大作中所探讨的问题异曲同工了,它犹如由高低两个声部组成的一首歌曲,虽有轻重缓急、高低显隐之别,但表达的却是同一个主题——中国古越族与日、韩古代文化的关系至亲至密。

为此,我还想建议苑利同志,在完成本课题研究之后,可以进一步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北亚地区,继续探索中国古代百越族与日本、韩国古代文化的交流历史,相信以他的学识和精力,必能作出更大的成绩来。让他在“被北来说包围的学术界”竖起的那面“与众不同的旗帜”永远飘扬!

陈文华

1999年5月15日于南昌青山湖畔

董 序

我与苑利先生素昧平生，他给我寄来《韩民族文化源流》一书的二校，嘱我写序，这使我感到十分突然。由于感到突然，所以立刻坐下拜读，一读就被它吸引住了。

学术研究的任务是探索未知，苑利先生这本书的可贵之处，是勇于探索一个前人鲜有涉及的未知世界：朝鲜半岛与东南沿海的民族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过去只有依稀的感觉，读了苑著以后，这种感觉才逐渐明朗起来。

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的族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研究者多从自己的学养出发，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苑著的新颖处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在所有的文化要素中，语言是随性最大的一种。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历史事实已湮没失传，而古人名、古地名留下的语言化石却永远蕴藏着古老的历史信息。中国东南部吴越地区的古越语很有特色，其人名、地名的首字多为勾、朱（州）、姑、夫、无、乌、于、余、诸等。例如，勾吴、勾践、朱勾（州勾）、姑苏、姑冯、夫差、夫椒、无锡、芜湖、无疆、乌程、乌伤、于越、于潜、余杭、余祭、诸暨、诸樊等。其中，除勾、朱古属侯韵、州属幽韵外，姑、夫、无、乌、于、余、诸等字皆属鱼韵。可见，吴越的地名、人名基本上以鱼韵发声，个别以侯、幽韵发声。侯韵、幽韵都是鱼韵的邻韵，它们的元音相近，古可旁转。中国东南沿海的这种古越语人名、地名、也见于山东、东北、朝鲜半岛等地。《三国志·魏书·高句丽列传》开头说：“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高句丽，《汉书》与《后汉书》均称勾丽。高古霄部，勾古侯部，它们是邻韵。高句丽，又称勾丽，

反映古越语的复音特点。勾丽、夫余、朱蒙，以及下文“乌引”、“乌违”二人，都与吴越地区的古越语人名、地名同其韵味。又《百济列传》开头说：“百济国，其先出自夫余，其国北去高勾丽千余里，处小海之南。”下文“其王余庆”、“长史余礼”等，都有古越语特点。

中国古代文献称东北亚民族为貊、秽。《诗经·大雅·韩奕》称“貊”；《墨子·明鬼中》称“胡貊”；《逸周书·王会解》称“秽人”；《管子·小匡篇》称“秽貉”；《吕氏春秋·恃君篇》称“夷貉”；《山海经·海内西经》称“貊国”；《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皆称“秽貉”；《后汉书·东夷列传》称“涉貉”；《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称“涉貉”。咸镜南道日本海沿岸贞柏洞一号墓出土、年代属公元前一世纪的“夫租蕨君”铭文银印，其“夫租”有古越语特点，银印的“蕨”与文献之“秽”、“涉”都是岁字的变体。

郭沫若曾详细论证“岁戌古本一字”^①。岁与戌上古同字同音，都属鱼韵^②。与秽(涉)连称的“貊”、“貉”^③，上古音都属明母铎部。鱼铎主元音相同，都是a，韵尾的发音部位也相同，古可对转，通假之例甚多，不烦列举。秽(涉)人即越人，与秽(涉)连称的貊、貉当是古越人的一支。《史记·匈奴列传》“以临胡貉”，《索隐》曰：“貉，即涉也。”即其证。

在中国古文献中，东北亚民族与中国南方越族有时同其称呼。例如，在同一本《诗经》里，大雅《韩奕》的“貊”指东北亚民族，鲁颂《閟宫》的“貉”，指东南越人。汉魏时，东北亚民族称“秽(涉)貉”，

① 郭沫若《释岁》，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第154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现有韵书都把岁、戌归入月部，失之。详见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31~3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 貉字有两种读音，作为祭名，字通褐，属鱼部；作为族称，通常指东北亚民族名，字通貊，属铎部。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称“骆越”。

“骆”字作为族名使用,最早见于《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佗因所以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集解》引《汉书音义》曰:“骆,越也。”

《汉书·贾捐之传》的《捐珠崖议》说“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骆越连称。《后汉书·马援传》:“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李贤注:“骆者,越别名。”

骆字上古音在铎部,岁与越在鱼部,鱼铎古可对转。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把骆、貉、夏(古属鱼部)同归豫部。西南的“骆越”已被公认是百越之一,东北的“秽貉”也是越种。“秽貉”与“骆越”,好比《逸周书》的“越戏(古音呼)”,《春秋》的“於越”,都是“越”的古越语复音记音,反映了古越语的“胶着语”特点。

夏,古文献又称“夏后”,“夏后”也是古越语的胶着语遗存^①。

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南的吴越地区,存在相同的语言化石,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们都属“东亚地中海”文化圈。

由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澎湖列岛,形成一个海域——“东亚地中海”。在上古时代,东亚地中海沿岸各地区的文化多有类同,可称为“东亚地中海文化”。

东亚地中海文化有以下特点:水稻种植、干栏式住房、崇拜鸟图腾、爱好玉器,有拔牙、文身、猎头习俗等。

在上述诸项文化中,稻作文化最为重要。在东亚地中海沿岸各地区中,中国东南部的吴越地区是世界稻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罗家角、河姆渡的稻作遗存距今七千年左右。东亚地中海沿岸各地的稻作文化都由吴越地区直接或间接传入。苑著《韩民族文化

^① 夏为什么又称“夏后”,自古不得其解,笔者以“古越语”说之,希望能使人满意。详见拙撰《中华文化通志·吴越文化志》第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源流》十分重视稻作文化的作用,可谓卓识。“民以食为天”,稻作文化的输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半岛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使当地经济、文化出现质的飞跃。

在上古时代,人几乎是文化的唯一载体,稻作文化的传入很可能与稻作民族的迁入有关。费孝通把中国人种分为五大类型,其中,浙江、安徽、江苏的人种竟然与朝鲜人最为相似^①。此中原因,颇可发人深思。

地处中国浙江南部沿海的瑞安、平阳、苍南三县,近年发现一种南方罕见的石棚墓。据不完全统计,现已发现45座,其中,瑞安40座,平阳3座、苍南2座。这些石棚墓都分布在当地古代海边山上。近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瑞安发掘了30多座石棚墓,从出土的随葬品判断,年代属西周与春秋,形制与韩国、日本的石棚墓相仿,与中国辽东半岛的石棚墓不同。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东南沿海与朝鲜半岛之间,有着相当深远的文化联系。苑著《韩民族文化源流》对这种关系开始作全面探索,是一件富有创意的工作,它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启发了人们的思路,不但有利于韩民族文化源流的探索,而且对百越文化的研究也大有助益。

董楚平

1999年国庆假日于杭州

^① 详见本书第23页。

自序

关于韩文化起源,由于研究者学术视野不同,研究方法不同,研究角度不同,所用材料不同,结论上也有较大差异。从地域看,有山东说,陕西韩城说,辽宁红山说,松嫩平原说、西伯利亚说;从民族看,又有东夷说、东胡说、通古斯说,古亚细亚说等等。这些学说一个共同特点是,都认为韩文化起源于北方,与北方文化息息相关,它的考古学证据,便是韩半岛有文土器的出土。至于韩文化与南方民族的关系问题,则很少有人涉及,更没有系统论述,即或有人提及,也只能使人感觉到韩文化中虽有某些南方文化因素,但这些因素与韩民族来源似乎并无什么瓜葛。

笔者认为,在韩民族先史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北方文化的影响,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与之相比,南方文化对韩半岛早期文明的影响似乎更大些,这一文化的考古学物化标志,便是公元前十世纪左右携稻作文化涌入韩半岛的无文土器文化。它的传入,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韩半岛传统文化性格,而且奠定了此后韩文化的基本走势。因此,找到了它,就等于找到了韩文化之根,抓住了它,就等于抓住了韩文化的核心。我认为这支稻作文化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如果这个推论不错,那么,韩文化也应根在中国东南。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非否认韩文化中的北方文化因素,事实上,不用说由于箕子、卫满朝鲜,蒙古、契丹大军入主韩半岛,给韩半岛带去诸多北方文化因素,就是我们在南来说中所提到的、为韩半岛文明带来极大影响的中国南方文明中也不乏北方文化因素,

如夏文化对百越文化的影响,周文化对吴文化的影响等等,都是信手拈来的例。在这里我只想说:尽管韩文化中不乏北方文化因素,但其主体部分仍是中国南方的百越文化,它代表了韩文化的基本特征。

南来说的提出,是想在被北来说包围的学术界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强调一下中国南方百越文化对韩半岛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引起学界对百越文化的重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便十二分满足了,因为这毕竟是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作 者

1997年7月20日